

《耕织图》与蚕织文化

臧军

《耕织图》为南宋绍兴初年於潜县令楼璹任内所绘，全图共 45 幅，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为耕，设图 21 幅；第二部分为织，设图 24 幅。每幅配五言诗一首，“图绘以尽其状，诗歌以尽其情，一时朝野传诵几遍”。宋、元、明、清各朝及日本、朝鲜等国众多摹本流传（已知国内版本 30 余种、国外版本近 20 种），并通过陶器、壁画、雕刻、年画等载体广泛传播，在中国历史上形成一种特有的《耕织图》文化现象，不仅对中国和东南亚地区的耕织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而且还远及欧洲，被誉为“世界第一部农业科普画册”，^{〔1〕}成为举世瞩目的珍品。

一、《耕织图》诞生后所形成的文化现象

楼璹的《耕织图》有正本和副本，正本进呈宋高宗，被翰林图画精致摹绘成彩色绢本，收于宫内，成为皇帝、皇后了解与监督农桑的参考资料和艺术欣赏品。副本留在家中，后由楼璹的侄儿楼钥题跋；其孙楼洪、楼深刻石保留，并在民间流传。^{〔2〕}由于《耕织图》迎合了统治者的需要和“四方习俗间有不同，其大略不外于此”，直观形象，通俗易懂，便于传诵，雅俗共赏，具有广泛的指导意义，颇受政府的青睐和农民的欢迎，因此，各州、县府

中均绘有《耕织图》，甚至连“郡县所治大门东西壁皆画《耕织图》，使民得而观之”，^{〔3〕}一时兴起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次《耕织图》热潮。宋时，较为著名的《耕织图》，摹本有楼钥本、楼深和楼洪刻石本、吴皇后题注本、刘松年本、梁楷本、汪纲本、楼杓本等。

元、明、清各朝《耕织图》摹本纷纷问世，著名的有元程棨本、杨叔谦和赵孟頫本；明宋宗鲁本、邝璠本、仇英本、唐寅本；清焦秉贞本、冷枚本、陈枚本、雍正本、乾隆本、於潜县志本等。清朝统治者尤其重视《耕织图》的绘制与宣传，康熙南巡时获得《耕织图》，便于康熙三十五年（1699）二月，命焦秉贞仿楼璹图绘成《御制耕织图》，并亲自写序，印发各地，劝谕农桑。后，雍正、乾隆各朝也予效法，摹绘《耕织图》以示重视农桑，一时摹刻《耕织图》之风再次大盛。嘉庆时，仁宗六十大寿，“夹路彩廊，左为耕图，右为织图，用绢为田夫红女，按农桑事次第，各录御制诗一篇，凡四十楹”。^{〔4〕}一些农书以各种形式摹刻《耕织图》；一些县级机构亦刻板印发《耕织图》，如光绪《於潜县志》和嘉庆《什邡县志》等均有《耕织图》；一些石刻、窗户木雕、瓷器彩绘、织花纹样、年画、纸币等有《耕织图》图

案,如故宫博物院藏清康熙五彩《耕织图》“春碓”纹瓶和彩瓷农耕图扁壶,⁽⁵⁾天津和苏州也印制了大量的杨柳青和姑苏《耕织图》年画广为发行。⁽⁶⁾当时各种形式的《耕织图》成为十分令人注目、家喻户晓的农业生产技术知识普及宣传画,对农业生产技术的改进与发展无疑有促进作用。

及至现代和当代,《耕织图》已成为历史文化遗产而引起各方面的关注,早在30年代,鲁迅先生曾计划以木刻形式重印出版整套《耕织图》。1933年《故宫周刊》从总244期至总289期,每期刊登一幅,刊登了一套清雍正《耕织图》,当时在文化界曾有过较大的影响。1935年的《故宫周刊》第478至510期,陆续登载了清康熙《耕织图》墨宝。在中国农业博物馆古代农业科技史陈列馆馆首,就陈列着巨大的《耕织图》画面四十四幅(清焦秉贞摹本),由此引出了我国男耕女织、农桑并举的农业发展史。中国丝绸博物馆序幕厅门首,围绕圆形中央展台一圈的是《耕织图》“织图”木刻摹本(宋吴皇后题注本),展示了从采桑养蚕到缫丝织绸的整个生产过程,在展台上展出的是《耕织图》中提花机的复原模型,由此道出了我国古老悠久的蚕丝生产文明史。在浙江丝绸工学院丝绸史研究室陈列部也同样陈列着彩色绢画《耕织图》摹本,展示了我国光辉灿烂的蚕织文化……台北大学赵雅书、浙江农科院蒋献龙、中国丝绸博物馆赵丰、中国农业博物馆王潮生、中国历史博物馆蒋文光和李露露、黑龙江博物馆林桂英、郑州大学荆三林和李趁有等一部分学者、专家开始对《耕织图》文化现象进行研究。国内有影响的一些专业刊物,如《中国农史》、《农业考古》《文物》《丝绸史研究》等也先后刊登《耕织图》方面的研究论文。中国农业博物馆还在1986年3月编辑印刷了《中国古代耕织图选集》,选录了二

十七种不同版本的《耕织图》画面。最近,在云南发现一百多幅连环画形式的反映苗族人民耕织生产的画卷,每幅彩图旁均有文字说明,据初步考证,此图为清季苗人仿汉人《耕织图》而制,只不过画面扩充进了苗人的生产习惯和生活情趣。该图的发现并据此挖掘整理的一系列资料,必将为宏扬我国苗族古老的文化史、民族史、民俗史做出贡献。

由是可见,《耕织图》所包含的深沉的文化内涵其影响是广泛的,意义是深远的。

二、《耕织图》对蚕织科技发展的推进

1. 我国第一部完整记载蚕织生产全过程的画卷

中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农业文明起源地之一,也是世界上最早养蚕丝织的国家,早在5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就有了丝绸生产,⁽⁷⁾在4000年前的夏代中国九州已有六个州出产丝织品⁽⁸⁾,此足见中国蚕织文化之悠久。历史上向有“嫫祖养蚕”传说流芳千古,《通鉴外纪》、《淮南子》等古籍乃至历代的农书都复述着这一几乎成为经典的蚕织起源说;文物考古事实也证明了中国的蚕织业的出现至迟不少于距今5000年—1926年,在山西省夏县西阴村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半个人工切割过的蚕茧,茧长15.2毫米、幅宽7.1毫米⁽⁹⁾;1958年在浙江吴兴县钱山漾新石器遗址中又发现一批经过先缫后织的桑蚕丝。蚕织生产在《诗经》诸篇中有较多的记载;后又有专门记述蚕织生产的著作,如唐代的《蚕经》、五代时期孙光宪的《蚕书》二卷、北宋《淮南王养蚕经》等,但都局限于文字⁽¹⁰⁾历代虽也有一些反映蚕织的直观图象(如汉画象石上的缫丝图、并丝图,宋《女孝经图》拈丝图),但都未表现出蚕织生产的全过程。楼璩《耕织图》的问世才宣告我国第一部记载妇女蚕织生产全过

程画卷的产生。

2.首载了我国蚕织生产的几个重要生产技术

今天能见到的最早的楼琬《耕织图》，是宋高宗绢画《蚕织图》，此图为楼琬献图不久，宋高宗命翰林图画院摹绘，吴皇后在摹本下方为每幅画面题写了小注。此图为线描、淡彩，长 513 厘米、高 27.5 厘米，以一长廊式的连房为经，每一房为一图，每图状一事，呈长卷形，全卷共分二十五段，详尽地描绘了养蚕自“浴蚕”开始，纺织至“下机入箱”为止的程序，这幅绢画给我们带来了令人振奋的信息：

绘有我国最早的脚踏缫车图象⁽¹¹⁾。脚踏缫车由手摇缫车发展而来，是手工缫丝机器改革的最高成就。手摇缫车必须两人操作：一人投茧索绪添绪，一人手摇丝车。而脚踏缫车可由一人分别用手和脚来完成索绪、添绪和回转丝车过程，使缫丝功效倍增。汉代即有脚踏织机，受其启发，唐宋之际便有了脚踏缫车，秦观《蚕书》有载，但未具体写明脚踏机构，《耕织图》“生缫”一图便详尽描绘了脚踏缫丝车的结构及操作方法，这是目前所见我国（乃至世界）最早的脚踏缫丝车图象。这一图象充分地说明脚踏缫车在宋代已基本定型，从而改写了以往人们把明代脚踏缫车图视为最早图象的历史⁽¹²⁾。

绘有我国乃至世界上最早的提花机。约在商朝已有平纹织机，周朝出现提花机，西汉初年，陈宝光之妻创制了一种新的提花机，六十天能织成一匹散花绫，“匹值万钱”⁽¹³⁾，但机构笨重，不便操作，功效较低。三国时马钧又进行简化改造，后经过唐、宋几代不断改进提高，提花机才逐渐完善而定型。我国古代文献虽有关于提花织作的记载，但对花机的机件结构都语焉不详，更难得图象留传。山西开化寺壁画上的花机画于北宋，形象最早，但不

完备。《蚕织图》第一次绘出了花机的全部机件、结构的操作方法。《天工开物》、《农政全书》所绘花机晚于此卷四百余年。⁽¹⁴⁾我们从图上可看到它有双经轴和十片综，上有提花工，下有织工，互相呼应，正在织造，织造方式与东汉王逸《机妇赋》的描述十分相似⁽¹⁵⁾。这种提花机，是我国独创运用花本控制的提综程序原理制成的，成为世界上最先进的手工程序控制机构，这一技术原理直到十八世纪后半叶（即 600 多年以后）才被法国工匠嘉卡消化吸收改进为机械式的嘉卡提花机，从而才开创了产业革命丝织大工业生产机械程控提花机的新时代。⁽¹⁶⁾可见《耕织图》对世界产业革命的推动功绩是不可估量的。人们称这幅提花机图象为世界上最早的结构完整的大型提花机，并将其收入《中国之最》（胡道静著）、《中国文化艺术之最》、《中国大百科全书·纺织》等工具书。

最早绘有窖茧的技术图象。“盐茧瓮藏”是蓄茧的科学技术措施这一，在我国最早见于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用盐杀茧，易缫而丝韧”。秦观的《蚕书》也有记载，但以图象直接反映窖蚕场面当以楼琬为先。《蚕织图》“窖茧”画面只画三人操作，一在桌上收茧，一在称茧，一在和泥，远处桌上有盛盐的碗，便把瓮藏方法表现得简单明了，直观形象，易懂便学。

3.推动了蚕织、棉纺生产技术的发展

《耕织图》的流传，不仅推动了蚕丝业的发展，而且还促使了棉纺生产的不断前进，并由此涌现了更具有生产技术推广明确目的的纺织科普画卷。如清乾隆三十年（1765）直隶（今河北）总督方观承主持绘制《棉花图》十六幅，内容为植棉、纺绩、织染、成布整个棉花生产和加工过程，乾隆为每图题有七言诗一首，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该图曾被译成日文出版，流传海外⁽¹⁷⁾。光绪十六年（1890）宗承烈的

《蚕桑图》问世，其据《蚕桑说略》一书配图，名《蚕桑图说》，旨在推广江浙一带蚕桑生产的经验和技術，全图共十五幅，其中桑五图、蚕十图，每图上方有较详的说明文字。光绪年间还有木刻《桑织图》画册，为二十四幅册页组成，画幅纵 32 厘米、横 28.6 厘米，每图有七言诗一首，图册首有诗《种桑歌》，尾有跋语，主要反映了清代关中地区从事植桑、养蚕、丝织生产的过程。光绪年间所刻《耕织图》，因 1978 年在河南省博爱县邬庄发现而取名博爱《耕织图》，该石刻共有 20 幅画面，分别刻在四块长 200 厘米，宽 30 厘米的青石上，画面共分两组，第一组为耕图，设耕地、运苗直至庆丰收等十幅；第二组为织图，设（棉花）耕种、纺织等十幅，该刻石是我国至今发现较早的加工棉花系列图刻石。

同时，《耕织图》的织图画面有清时被移植至其它工艺品中广为传播，如故宫博物院藏清康熙彩瓷“耕织图”之“窖茧”、“分箔”纹瓶和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景德镇窑彩瓷葫芦“择茧”图⁽¹⁸⁾，杨柳青和姑苏年画“蚕织图”传播范围则更为广泛。

4. 促进了《耕织图》诞生地於潜地区的蚕织生产

《耕织图》诞生地杭州於潜县（今属临安县）东距杭州 50 公里，地处浙江西部，天目溪自北而南纵贯全境，上游为山区，中游为丘陵地区，下游则形成一片较大的河谷小平原。自古以来，以农为主，农、林、桑并举。唐时，於潜的丝织品就已成为外贸和贡赋之品，钱鏐为吴越国王后，采取“世方喋血以事干戈，我且闭关而修蚕织”的国策，“劝民农桑”，史载钱鏐“善诱黎氓……八蚕桑拓”，采用各种方法劝导百姓经营蚕桑丝织，一年之中蚕可八熟。不但农村“桑麻遍野”，城镇也是“春巷摘桑喧女”。宋熙宁六年（1073），杭州通判苏东

坡巡视於潜时所写《山林》诗中，有“桑枝碍引路，瓜蔓网疏离”之句，可见当时於潜乡村种桑之普遍。《梦粱录》载：“绵，以临安於潜白而细密者佳”；则反映了於潜丝织业之盛状。

南宋时期的杭州丝织业盛况空前，成为当时丝绸的都会，官办和民间的丝织工场兴旺，如仅绫绵院，就有织机数百架，工匠数千人，且其“造作事务繁冗”，可见规模颇宏。这与统治者的重视《耕织图》的宣传是分不开的。然至清初，“旗兵放马纵牧，残损桑田”，致使桑叶奇缺，“桑叶怕贵丝怕贱，卖丝不够买叶钱。”⁽¹⁹⁾其后，统治者察觉到“公私仰给，惟蚕丝是赖”，遂开始重视与恢复蚕业。随着康熙南巡，《耕织图》摹本的绘制与流传，蚕桑得以较快的发展。光绪《於潜县志·风俗志》载：“蚕桑之利，合境皆有，南乡地暖，植尤盛。所出东乡为上。”“民生大计，首重农桑，潜邑男务耕耘，女勤蚕织”。“月令季春幼蚕事，邑中户户养蚕足。”并在《食货志》中详细介绍了养蚕种桑的生产技巧。时於潜盛产绉、绢、绵等蚕丝织品。⁽²⁰⁾据《续文献通考》记载，光绪年间包括於潜、临安等 9 县在内的杭州府产茧 16 万担，仅次于 17 万担的湖州府，而高于 14 万担的嘉兴府。随着科学的发展，在桑树、蚕种、养蚕方法、缫丝技术上都有了改进。民国 23 年，於潜被列为全省十六个蚕业改良区之一，民国 35 年还引种日本桑苗 1 万株，后逐渐淘汰高大的乔木桑（在楼嵒、焦秉贞、何太青的《耕织图·采桑》中均绘有高大的乔木桑，人登梯上树而采桑叶，甚为不便），栽植中杆和矮杆桑，并将桑园，向山地发展。在《耕织图》中可见南宋蚕农就已注重适时收蚁、稚蚕加温和选叶、壮蚕稀座饱食和上簇加温，迄民国，则提倡共同催青、稚蚕共育、消毒防病。1979 年始，於潜等地“三秋”养蚕布局

改为“两秋”，催青设专室，加温设备始用木炭火缸，后改电炉、空调机。

悠久的丝织文化随着历史的积淀，不知不觉中渗透进现代农民的意识，於潜人继承了楼璩《耕织图》中描绘的“男务耕耘，女勤蚕织”的传统，1986年地处杭徽公路沿线的对石、藻溪、横塘等乡镇，以织造绸缎、化纤布为主要产品的家庭纺织工业户达673户，占三乡总农户的12.27%。仅1987年对石乡绸机织户的人均收入就达2000元，较全县农民人均收入1033元高出近千元。1991年，临安全县有织机2万余台，其中於潜有6000余台，而被誉为“丝织之乡”的藻溪镇就有上千台织绸机，镇上90%以上的农户都拥有绸机，一般每户1至3台绸机，而略有殷富者拥有规模较大的“400锭捻丝机”和成套丝织机器设备。镇上新辟一条街道，两旁均是星罗棋布，比肩接踵的丝绸商店、织机零配件及修理店，是名副其实的“丝绸街”。镇上还辟有“丝绸市场”设摊位200余处，每天成交额均在100万元以上，交易的有丝和绸缎被面，仅农户织的丝绸被面一天就至少要外销10万余条，销往全国各地及苏联、印度、缅甸、日本等国。余杭、萧山诸县虽也设有丝绸市场，但多不直接生产，而从藻溪丝绸市场购进货源，迄今藻溪“丝绸市场”已成为全国丝绸被面行业中有影响的市场。

三、《耕织图》对国际蚕织文化的影响

丝绸发源于中国，随着岁月的流逝，中国的养蚕丝织技术逐渐传到国外。在3000多年前，商代中国的养蚕法已传到朝鲜；⁽²¹⁾在2900年前的周朝，中国的丝织品传到中亚细亚地区；⁽²²⁾2500年前的东周时期，中国丝绸便传到了西亚和欧洲诸国；⁽²³⁾西汉武帝元光二年（前135年），张骞出使西亚，为中国开拓官方西北丝绸之路之始。此后，官方和民间所开辟的“丝

绸之路”从草原、陆地、海洋等处使中国的丝绸技术与文化更快地走向世界。楼璩《耕织图》诞生后，引起了各国的关注，东南亚地区尤甚。

1. 许多图象堪称世界第一

楼璩《耕织图》中绘制的大量农具图、织具图不仅在中国属首创，而且还摘取了数个“世界之最”的桂冠，并对世界农耕、蚕织、纺织生产技术的发展与改进有划时代的意义（本文第二部分已有论及，此不赘述）。因此，从某个意义上讲楼璩《耕织图》研究是具有国际意义的，仅十二世纪提花机结构、操作原理对法国十八世纪机械革命的推进便是一个最有说服力的明证。

2. 东南亚国家出现众多的摹本

宋元以后，在东南亚地区一度形成了《耕织图》风靡一时，与政治、经济、文化发生了密切的联系。日本至迟在十五世纪就有楼璩《耕织图》摹本出现，后各种摹本、演化本接踵面世，对十六至二十世纪日本农桑生产技术的发展；文化流派和艺术绘画风格的形成具有较深的渗透。已知版本主要有：相阿弥本。相阿弥（？至1525年），日本画家，曾据南宋梁楷《耕织图》摹本而绘“耕织两卷”，今藏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狩野之信本。狩野之信（1476至1559年）仿明宋宗鲁刻本而作《耕织图》，但今仅存四季耕作图八幅；狩野永纳本。延宝四年（1676）日本画家狩野永纳据宋宗鲁本翻刻，在日本较为普遍流行，今藏日本内阁大库及早稻田大学图书馆；既白本，既白为日本画师，曾摹有耕、织图各一卷，绢本着彩，画面豪华，今藏日本历史民俗博物馆；橘守国本。橘守国（1679至1748年），日本画师，其受狩野派画技的影响，也绘有《耕织图》，并先后收入1729年刊《绘本通宝志》和1944年刊《绘本直指宝》两籍，今存早稻

田大学图书馆和东洋文库；姬路藩本。从现藏日本内库的《舶来书目》中可知，至迟在享保十年（1725）焦秉贞的《耕织图》就传入了日本，不久后的文化五年（1808）姬路藩摹绘刊刻发行焦秉贞摹本在日本也相当普及；吴春本。吴春（1752至1811年），日本画师，以焦秉贞本作底本，摹绘出西本寺鉴正局四季耕作图隔扇四十七幅；上野藏本。因原藏日本上野博物馆得名，绘图时间、作者未明，今存织图二十一幅，每图右面用隶书题写标题，据日本学者天野元之助先生分析，此图可能是《便民图纂》等版本的摹刻本；⁽²⁴⁾渡道本。渡道华山为日本画师，其参照狩野永纳《耕织图》本而绘成，1977年在日本爱知县仅发现《织图》二十四幅；还有狩野探幽（1602至1674年）本等。至今，在日本各地的寺庙、宫殿、民间居室等地方都还可以看到以《耕织图》为范本的古代装饰画。如高野山的遍照尊院所藏“织图贴交屏风”22幅，西禅院有“耕织图隔扇”，惠光院有“四季耕作图隔扇”，赤松院有“四季耕作图屏风”等。还有日本江户时代的农书《成形图说》，就是受《耕织图》影响最深的一部著作。⁽²⁵⁾

朝鲜也有一些《耕织图》的摹本流传，已知有：金弘道（1745至1815年），朝鲜画家，曾绘《耕织图》，每图右边以楷书书写楼璩之诗，此图现藏韩国汉城博物馆，据析，此图可能是参照我国明代画家宋宗鲁本或日本狩野本而作；金斗梁画的《秋冬田园行猎胜会》图，画面内容、结构与楼璩《耕织图》同，现藏韩国旧德寿宫美术馆。还有朝鲜人仿楼璩后裔楼杓刻本而摹绘的《耕织图》及《田家乐事》等传世。⁽²⁶⁾

另有琉球本等。

不仅如此，《耕织图》的影响还远及欧洲，如18世纪末在欧洲制造的陶瓷饮料

杯，就以中国的《耕织图》场景代替惯用的英国田园风景画。⁽²⁷⁾

3. 日本学者的《耕织图》研究

日本学者对《耕织图》抱有极浓厚的兴趣。周藤吉之、下山重丸、久野幸子、武田恒夫、大庭修、山冈泰造、渡部武、米尺嘉圃、天野元之助、佐藤雅彦、小野忠重、大谷健夫等学者多年从事《耕织图》研究；而东海大学文学部教授渡部武先生的研究成果最丰，也最令人瞩目，他所涉及的《耕织图》版本就近60种，并从文化史、文献史、农史、科技史、风俗史、美术史、等方面进行探索，尤其是对《耕织图》在日本的流传与影响的研究，见解精辟、造诣颇深，并就《耕织图》研究出版了论文专集，还在中国大陆发表了《〈耕织图〉流传考》《中国农书〈耕织图〉的起源与流传》、《“探幽缩图”中的“耕织图”与高野山遍照尊院所藏“织图”》等力作。1987年5月至6月渡部武先生来中国讲学访问，在北京、南京、广州等地农科研究部门作了题为《〈耕织图〉的流传及其在文化史上的意义》等学术报告，在我国农史学界产生较大的反响，并给我国农科史研究带来了一些新的启发。1992年8月23日至24日，渡部武先生专程赴《耕织图》诞生地临安县於潜地区的一些乡镇考察两天，受到了当地有关部门的热情款待。在笔者的陪同下，他考察了临安较大的丝绸生产厂家浙西丝织厂和萍溪丝绸市场、於潜镇的浙西丝绸市场、乐平桑园、乐平养蚕农户的农民织绸户、乐平印染厂等，并与临安的《耕织图》研究者和农业、丝绸技术人员进行了探讨，交流了资料。随后，渡部武先生参加了8月25至30日在杭州举行的“中国科技史国际学术讨论会”，在会上宣讲了他的论文《〈耕织图〉对日本文化的影响》。另外，在1987年11月，日本信州大学教授岛崎昭

典博士在浙江农业大学讲学后,偕夫人慕名专程赴於潜考察《耕织图》故乡的耕织新貌。日本学者的来访,不仅促进了中日双方的文化学术交流活动,而且增进了两

国人民的友谊,更为中日两国学者共同研究《耕织图》的广泛文化意义奠定了基础。

(1) 蒋献龙《於潜县令耕织图的国际影响》,《杭州蚕桑》1989年第3期。

(2) 缕钥《玫瑰集》卷七十八。

(3) 虞集《道园学古录·题楼玫瑰耕织图》。

(4) 臧军《南宋楼琬耕织图及其流传》,《浙江方志》1988年4期。

(5) 《清代陶瓷大全》173页,台北艺术家出版社1989年6月版。

(6) (日)渡部武《中国农书耕织图的起源与流传》,《中华文史论丛》第48辑,上海古籍出版社。

(7) 《中国大百科全书·纺织》彩色插图1,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年。

(8) 蒋献龙《世界蚕丝业科技大事记注释》,《农业考古》1990年第1期416页。

(9) 《中国之最》314页,胡道静著,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年版。

(10) 《中国农学书录》52页,王毓瑚编著,农业出版社,1979年版。

(11) 《南宋京城杭州》105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12) 《中国纺织科技史·古代部分》165页,科学技术出版社,1984年版。

(13) 《中国古代科技名人传》80页,中国青年出版,1981年版。

(14) 林桂英、刘锋彤《宋<蚕织图>初探》,《文物》1984年10期。

(15) 《中国的丝绸》112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16) 《中国文化史三百题》731页,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

(17) 王潮生《明清时期的几种耕织图》,《农业考古》1983年1期。

(18) 李纪贤《康熙五彩<耕织图>纹瓶》,《文物》1979年8期。

(19) 嘉庆《於潜县志》卷十五。

(20) 光绪《於潜县志·食货志》。

(21) 《汉书·地理志》。

(22) 《穆天子传》卷三。

(23) 《中国绢丝西传史》,姚宝献著,商务印书馆。

(24) 赵丰《<蚕织图>的版本及所见南宋蚕织技术》,《农业考古》1986年1期。

(25) 《中国农史》1987年2期封三。

(26) (日)渡部武著《中国农书耕织图的流传和影响》,日本版(昭和62年3月印制)版图23。

(27) 《中国文史论丛》第48辑。

(本文编辑:欧阳宗俊 终校:党华)